

# 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之于日本经济体制决定性影响说质疑

任文峰

**内容提要** 国内学术界传统观点认为，战后美国占领当局推行的经济民主化改革对于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日本经济体制在改革后焕然一新，与之前的历史彻底切断了联系，踏上了新的历程。本文通过回顾考察历史，参考国外著名学者的理论，分析日本战后经济改革与日本现代经济体制的关系，认为当今的日本经济体制仍然是战时经济体制的延续，战后经济改革对日本经济体制并未产生过“决定性”影响。

**关键词** 日本现代经济体制 战后经济改革 1940 年体制

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是当今多数高校采用的教材，在其《世界史·现代编》（下卷）对于战后日本经济民主化改革<sup>1</sup>是这样评价的：“这项改革（指解散财阀等经济改革）打破了财阀家族垄断的半封建经济格局，为战后日本经济民主化发展铺平了道路，也为垄断资本主义创造了自由发展的条件。”<sup>2</sup>“战后初期日本的政治经济民主化改革，是一次从思想意识到政治、经济制度方面较为彻底的变革。从一定意义上说，它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为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铺平了道路。”<sup>3</sup>南开大学日本经济史专家杨栋梁也认为“战后日本的经济制度及经济体制改革，意味着经济领域发生了一次革命性的变革。”<sup>4</sup>这应当说是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然而，笔者在研习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对上述观点产生了以下的疑问：尽管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要求下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进行了美式的民主化的改革，那么为什么现代日本在政治方面是欧美式的民主政体，而经济方面却是与欧美风格迥异的“日本式经营”经济体制呢？美国占领当局的经济民主化改革对于战后日本的经济体制的影响，究竟是不是“决定性”的呢？本文通过考察日本经济体制的几大基本特征，参考当代国内外著名学者的论述，分析日本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与日本经济体制的关系，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当今日本经济体制其实仍是战时经济体制的延

续，因而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对于日本经济体制并没有产生过“决定性”影响。

## 一、历史考察：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目标与结果

众所周知，日本的战后改革完全是在美国主导下进行的。日本战败以后，美国占领当局发布了两个文件，阐明了占领和改造日本的目标与政策。一个是美国政府于1945年9月22日公布的《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方针》，另一个是1945年11月1日由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盟军司令官发布的《投降后初期对盟国最高司令官占领及管理日本的基本指令》。前者所表述的占领目标有两条：即“保证日本不再成为对美国或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最终建立起一个尊重其他国家的权利，并支持反映在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原则之中的美国的目标的和平的和负责任的政府”。后一个文件所规定的占领目标是“尽可能确保日本不再对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而且要培养各种条件，使日本作为负责任的且是和平的一员参加国际社会”。在经济方面，前者规定“日本军事力量现存的经济基础必须予以摧毁并且不允许其重新复活”，“消除那些主要用来准备战争的指定的工业或生产部门”，“让渡”那些“不是和平经济或为供应占领军所必须的产品的现有资本装备及设施”，作为对盟国的赔偿。同时还要求日本“在着手重建物质生产的同时”，必须“彻底改革其经济活动及经济制度”<sup>5</sup>。后者对前者进行了细化和补充，明确要求“拆除一切种类的武器、军需品及专门生产军用器材的现存设施”、“破坏重新创造或者维持危及国际和平的军备的日本经济能力”、“实施由适当的盟国当局所确定的某些赔偿及偿还计划”、“监督指导日本的经济组织的运营和操作确实符合占领的一般目的，并且使日本最终得以回归和平的贸易国家之列”。<sup>6</sup>

然而，像众多的国际条约一样，对于上述条文不能单单从字面上去理解。美国坚持对日本单独占领而坚决不同意重蹈德国的覆辙，其背后隐藏了对于维护本国利益的打算。美国的真实目的在于：“一、确保日本是美国的资本和商品出口的市场；二、将日本作为美国推行亚洲政策的‘远东工厂’；三、竭力利用日本的力量”<sup>7</sup>。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人主导的改革在政治上比较严厉，而在经济方面却那么不彻底。

在上述两个文件的总体目标之下，美国占领当局进行了众所周知的农地、解散财阀、劳动三大改革。由于农地改革和劳动改革对于日本经济体制的影响是非直接性的，限于文章篇幅，这里主要集中论述解散财阀的措施。

财阀是日本特有的垄断资本集团，是德川幕府时代封建特权商人与明治政权相结合而形成的有势力的财团。不同于欧美各国的垄断资本，财阀以血缘和家族为轴心组成，与政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战前和战争期间，它是支撑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经济基础和对外侵略的主要推动力量。美国充分认识到，要铲除日本的军国主义，使之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仅仅解散日本的军队，废除军事机构是不够的，还必须摧毁其经济基础。1945年10月20日，美国占领军总司令指令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15家财阀向其提交有关经营内容和资本结构的报告书，并于同年11月2日冻结其资产。日本政府和财阀们虽然抵制，但在总司令部的压力下，11月4日，日本政府还是发表了《关于解散控股公司的备忘录》，同意解散财阀。于是，上述15家财阀的证券被冻结，财阀集团被解散，83家控股公司的股票，按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部的指令，移归新设立的解散财阀的执行机构“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管理，并被公开拍卖。此后，财阀家族成员的公职被开除，他们的经济活动受到限制。与解散财阀相联系，1947年，日本政府又广泛开展反垄断行动，制订了《禁止垄断和保证公平交易法》，同年12月18日又发布《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以禁止垄断财团的复活，分散经济力量过度集中的企业。根据这一法律，325家公司被定为经济过度集中的企业，予以解散。

然而，如果对所有财阀都严厉打击，那么日本经济势必在短时间内将难以恢复，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占领目的。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特别是伴随着冷战的开始，解散财阀的工作，由于美国占领政策的转变导致其执行的极不彻底。作为负责解散财阀事宜的执行机构“控股公司整理委员会”仅仅解散了指定的83家公司中的32家，其余51家未被解散。《禁止垄断法》也是多次修改，大大放宽了限制，结果受到削弱的日本垄断企业多是那些与美国垄断资本进行直接竞争的部门和像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这样的世界市场上英、美强大的竞争对手。被指定为排除对象的大垄断企业共有325家，但最后实际采取排除措施分割的企业只有11家。

美国在实施解散财阀的工作中，始终没有对垄断银行进行解散和改造，这成为垄断财阀日后迅速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见，所谓的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中的重大措施之一——解散财阀，只是根据美国的国家战略解散了部分不利于美国国家利益或者与美国产业冲突的财阀，而对日本旧的经济体制没有实质性触动，无怪乎著名史学家小林义雄称“‘解散财阀’这个措施，比实际更有耀眼的外观”<sup>8</sup>。

## 二、 断续还是连续？对日本经济体制的考察

关于现代日本的经济体制，一般认为，“终身雇用、年功工资、企业内工会等反映的‘日本式劳使关系’，轻股东重职工的‘日本式经营’，以主银行为核心的‘银行系列’及互相持股，承包等‘企业系列’，没有明确依据却深入到经营细节的政府对民间的‘行政指导’等等，这些经济制度和经济习惯构成了‘现代日本经济体制’”。<sup>9</sup>具体讲，同欧美各国相比，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征：第一，在“企业内部关系”方面，由长期雇用、年功工资序列（工资随工龄递增）、按企业而不是按行业组织工会为主要内容；第二，在“企业与金融业的关系”方面，主要不是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和公司债券等“直接金融”的方式融资，而是主要通过银行信贷，即采取“间接金融”的方式获取资金，以及与之相关的在开展经营活动时，重视从业人员而非股东，第三，在“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方面，双方相互依存，构成一种封闭的格局。<sup>10</sup>

那么，这种经济体制到底是战前的遗产还是战后的创造呢？前文已经提到，传统观点认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是战后经济改革的创造。然而近年来不断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东京大学和一桥大学的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等学者运用比较制度分析和计量经济史学研究方法得出了不同结论：“构成这一体制（指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许多重要部分，是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前期日本经济的重工业化和战时经济化的过程中诞生的。”<sup>11</sup>“现代日本的经济体制，是战时创造的体制，是通过官僚制定的经济计划并以企业及企业集团为实行组织来实现的体制。”<sup>12</sup>这向传统的“战后史学”提出了挑战。

1995年一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野口悠纪雄的著作《1940年体制——兼论“战时经济”》出版，该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冈崎、奥野等人的观点。野口在序言中写道：“构成日本现代经济的主要因素是战争期间形成的”，“我认为日本经济体制依然是战时体制，并为之命名为1940年体制”。接着他阐述了立论的两条理由：其一，“这一时期日本产生了与以往不同的制度，日本型企业、间接为主的金融体系、直接税为主的税收体系、中央集权的财政制度等日本经济的特点，在日本原本并不存在，而是根据战时经济的要求被人为的导入的”；其二，经济体制的连续性问题，与战前、战后不连续的正统观点相反，战后的“人事和工作方法全部是连续的”，“不仅制度上的连续性令人吃惊，更重要的还在于官僚及企业家意识的连续性”。野口进一步指出，“这一体制的基本观念是生产优先主义和否定竞争，并且这一观念直至今日仍发挥着重大影响。”<sup>13</sup>

在具体论证上述观点时，野口悠纪雄以1940年为分界线，列举了经济体系变化的大量事实：企业经营方面，日本型企业的雏形就形成于战时——股东权利的削弱，由“股东主权”转变为“从业人员主权”，终身雇用制以及年功序列的工资体制在全国范围内扩大，劳资双方参加的企业内工会的普及，制造业中的转包制度产生并盛行；金融体制方面，间接金融体制的原型，存在于战时经济之中。而且日本现行的《日本银行法》就是以1939年纳粹德国制定的银行法为蓝本，作为战时金融统制的总则于1942年制定的，直至今日依然是日本金融制度的基本法；官僚体制方面，体现在行业统制会等组织的出现以及官僚思想的变化；财政制度方面则发生了以直接税为中心和向中央集权制度的转变；土地制度方面由于农地改革地主的力量和权利受到极大削弱等等。<sup>14</sup>野口悠纪雄以铁的事实证明了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不是美军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成果，而是“战时经济”体制的延续，对传统史学观点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在日本国内，对传统的“断续”的观点提出异议的并非个别现象。除了冈崎哲二、奥野正宽等人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源流》和野口悠纪雄的《1940年体制——兼论“战时经济”》外，山之内靖、J.Victor.Koschmann、成田龙一编的《总体战和现代化》、栗田健的《日本的劳动社会》、雨宫昭一的《战时战后体制论》、小林英夫的《帝国日本和总体战》<sup>15</sup>等也

是这方面著名的作品。可见，对长期居于日本史坛主流地位的传统的“战后史学”的挑战绝非一两个人的“孤军奋战”，而是已经成为当今日本史坛一股“重构日本现代史观的学术潮流”<sup>16</sup>。

### 三、“成效显著，体制延续”——对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再认识

随着历史学的发展和历史研究的深入，人们才得以一步一步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对于传统史学对日本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评价，无疑随着大量新史料的出现和新的史学方法的应用应当给予再认识。

有目共睹，日本经济在战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到八十年代又超过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一度“日本威胁论”、“黄祸论”等甚嚣尘上，《日本名列第一》这样的书籍也开始热销。以此为背景，世界各国的政界和学术界都开始探寻日本为何能创造这样的“奇迹”，而最终独具特色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被视为创造“日本奇迹”的主要原因。

那么，这一经济体制是如何形成的？何时产生的？这是人们极为关注的问题。而之所以会出现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局限，除了新史料和新的史学方法的缺乏外，还与其他原因有关。日本在战后长时间内处于美国的占领监督之下，学术界必然有所反映，很难发出否定美国战后改革的声音，同时日本经济长期处于高速增长，在“景气”的环境中也就鲜有学者对日本的经济体制进行反思；国内史学界由于有着重视政治史的传统，在其影响下认为日本在战败后处于美国占领下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政治改革，破除了法西斯军人专政的政治体制，同时占领当局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改革，于是自然认为日本战时的经济被摧毁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人建立的民主经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虽然批判了改革的不彻底性，却也没有注意到经济体制这一“盲区”。直到日本经济长期不景气人们才开始反思经济体制是不是有问题，“盲区”才被人们发现。

应当如何再认识战后的经济民主化改革呢？本文认为，可以用“成效显著，体制延续”八个字概括。首先，尽管改革存在不彻底性，但对于这场改革也没有理由完全否定，它确实“成效显著”，对于日本经济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功不可没。1945年日本战败，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美国要对日本进行彻底的民主改造，铲除日本封建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因素，一劳永逸地消除来自日本的战争威胁，将日本改造成一支和平力量。“这场民主改革，虽然是美国占领当局这一外来者做主角进行的，但从改革的内容上讲，却不是美国强加到日本国民头上的不可接受的事物，美国占领当局帮助日本完成了日本社会自身应该完成而无力完成的任务。所以，这场民主改革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sup>17</sup>另外，从改革的具体成效来看，农地改革和解散财阀等经济改革措施，给日本社会带来了经济民主，促进了日本经济的长远发展。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最终消灭了长期无法铲除的封建主义、军国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使得日本在战后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且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大批家族的、保守的财阀退出了财界，而具有实际经营能力的中上层管理人员登上了财界的领导岗位，引发了“经营者革命”，<sup>18</sup>这场革命是企业领导层形成年轻化、专业化的局面，为后来引进外国新技术，推行现代化企业管理方式铺平了道路。一批新企业家的崛起，成为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一大重要原因。

但是，对于改革的作用不应当过分夸大，“成效显著”是在“体制延续”的范围内发生的。为什么经过民主化改革，战时的经济体制却得以延续下来呢？“1940年体制论”的倡导者野口悠纪雄认为，“官僚机构未遭破坏得以存续的第一个原因，是占领军未采取军事管制，而是通过日本政府实行间接统治……但是，仅这一理由还不足以说明问题。更重要的原因是，占领军的改革设想，就经济问题而言是很不系统的。占领军本没有对日本的经济体制进行彻底变革的意图。”其次，他认为“就被称为战后三大经济改革的农地改革、解散财阀以及劳动改革而言，均存在局限性。例如，解散财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达到‘心理的和制度的非军事化’，具有强烈的政治和军事色彩。”<sup>19</sup>再次，他强调“日本的官僚组织并非被动地接受由占领军主导的改革。不仅如此，日本方面为了使旧体制得以延续，采取了巧妙的应付办法。”第四，他断言“和官僚制度一起，40年体制的主要成分得以留存，其中具有代表性

的，就是金融制度……以日本银行为顶点的金融界，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的体制。”为什么会  
出现上述情况？按照野口悠纪雄的观点，就是“由于冷战的发生，导致了改革方向的转变。”

20

对于日本经济而言，“战时形成的 1940 年体制直至现在依然存在，并构成经济的核心”。<sup>21</sup>因为对于作为“构成了当今日本经济的中枢”<sup>22</sup>的官僚制度和金融制度在战后改革中没有  
被触及。“以官僚统制对民间经济活动广泛干预和在财政税收制度中存在中央集权体制为特  
征的战时官僚机构”<sup>23</sup>得以保存下来，官僚的思想方法、官与民的关系以及财政税收制度等  
也被大致地继承；日本型企业、间接金融的原型存在战时就已经存在……这些最根本的要素  
没有被触动，日本经济体制自然就保持了其历史的连续性；而正是这些最核心的东西再次受  
到学者的关注，我们才从对传统观点的盲从中解脱出来。野口悠纪雄等人有关“1940 年体  
制”的确立的论述，无疑为人们研究当今日本政治经济体制，确定了一个参照系，从而使人们  
能够进一步对日本经济体制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综上所述，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乃是战时经济体制的延续，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没有像传  
统史学论述的那样对于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尽管战后改革“成效显著”，  
却只是在“体制延续”的范围内发生的，日本现代的经济体制在官僚制度、金融制度、企业  
制度等各方面依然是战时体制的延续。显然，历史的联系和延续是客观存在且无处不在的，  
至少在经济体制方面如此。

#### 注释：

<sup>1</sup>对于日本的战后经济民主化改革的概念，出于比较的需要，在本文中与《世界史》保持一致，指美国占领后进行的农地、劳动、解散财阀等改革。有的学者，如杨栋梁在《论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的形成——兼评“1940 年体制”》一文中认为，日本经济民主化改革在美国进行的民主改革后还是一直延续的。

<sup>2</sup>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22 页

<sup>3</sup>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史·现代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年版，第 123 页

<sup>4</sup>杨栋梁、江瑞平：《近代以来日本经济体制变革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88 页。书中杨栋梁认为，日本战后经济改革是在美国占领当局和日本政府“两个政策主体”的主导下进行的。并且“战后经济改革并未因美国对日占领的政策的变化而告终结”，而是在日本政府的主导下继续进行，“战后经济的制度性框架是在 1955 年前后固定下来的”，因此“战后型经济体制也可以称为‘五五年体制’”。

- 
- <sup>5</sup>大藏省財政史室編：「昭和財政史——終戦から議和まで17」資料1、東洋經濟新報社、1981年、19頁
- <sup>6</sup>同上，第26頁
- <sup>7</sup>小林義雄：《战后日本經濟史》，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8頁
- <sup>8</sup>同上，第20頁
- <sup>9</sup>岡崎哲二、奥野正寬編：「現代日本經濟システムの源流」、日本經濟新聞社、1995年、2頁。（轉引自馮瑋：《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經濟體制三大特征的形成——近年日本史壇新動向概述》，《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
- <sup>10</sup>同上，第2、3頁。
- <sup>11</sup>同上，第2頁。
- <sup>12</sup>同上，第4頁。
- <sup>13</sup>野口悠紀雄：「1940年體制——さらば戦時經濟」、東洋經濟新報社、2002年、第3頁。
- <sup>14</sup>對於這方面國內學者多有論述，可參見馮瑋：《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經濟體制三大特征的形成》，《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馮瑋：《日本战時經濟體制在战后的延續——“1940年體制論”解析》，《日本研究集林》2004年第1期；馮瑋：《“总体战”和现代日本間接金融體制的形成》，《史學集刊》2004年第4期；馮瑋：《“总体战體制論”：当今日本史壇值得關注的理論》，《歷史教學》2004年第6期；楊棟梁：《論日本战后型經濟體制的形成——兼評“1940年體制”》，《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
- <sup>15</sup>可參見山之內靖、J.Victor Koschmann、成田龍一編：《总体战和現代化》，柏書房，2000年版；栗田健：《日本的勞動社會》，東京大學出版會，1996年版；雨宮昭一：《战時战后體制論》，岩波書店，2001年版；小林英夫：《帝國日本と総力戦》，有志舎，2004年版
- <sup>16</sup>馮瑋：《日本战時經濟體制在战后的延續——“1940年體制論”解析》，《日本研究集林》2004年第1期
- <sup>17</sup>尹秀芝：《战后美國對日本的民主改革與日本現代化》，《北方論叢》1998年第4期
- <sup>18</sup>所謂“經營者革命”，指的是資本和經營一體化的體制（又叫所有者資本主義）變成資本與經營相對分立的新體制（又叫經營者資本主義）。參見王振鎖：《日本战后五十年（1945-1995）》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年版，第65頁
- <sup>19</sup>野口悠紀雄：「1940年體制——さらば戦時經濟」、東洋經濟新報社、2002年、第80頁。（轉引自馮瑋：《日本战時經濟體制在战后的延續——“1940年體制論”解析》，《日本研究集林》2004年第1期）
- <sup>20</sup>同上，第80-88頁
- <sup>21</sup>同上，第73頁
- <sup>22</sup>同上，第5頁
- <sup>23</sup>同上，第39頁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研究生 特約責任編輯 馮瑋）